

《史记·三代世表》“斜上”考

赵 益

司马迁《史记》创立“史表”之体，是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重要成就之一。虽然唐刘知幾对史表的内容在史书中的作用存有异议，但对史表的形式功能仍深为推崇，谓之“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脊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①至宋郑樵则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②后世遂无异辞。《史记》十表之首为《三代世表》，其形式特征，汉人桓谭总结为“旁行斜上”。《梁书·刘杳传》载：

王僧孺被敕撰谱，访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谭《新论》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以此而推，当起周代。”^③

后人遂常以“旁行斜上”概括“表”体本色。其中，“旁行”即谓“横行”，亦即由右而左之“左行”。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十五：“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佢卢，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佢卢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梵佢取法于净天，苍颉因华于鸟迹，文书〔画〕诚异，传理则同矣。”^④中国古代书写以竹简为主要载体，遂造成文字“直行”，与世界其他文明区域的文字迥异。但就史表而言，“直行”、“旁行”并不是指文字方向，而是指意义的逻辑方向。表格与单纯的文字书写有所不同，它是一种二维结构的意义表现方式，因此必然形成经纬交织之体，经为“直行”，纬即“旁行”。

但“斜上”何谓，前人均未明言，仅宽泛认为所谓“旁行斜上”即“经纬成文”，“使参错者归于条贯而已”。如宋程公锐《春秋分记》“周天王内鲁外诸侯年表”所云：“余今表周鲁以及外诸侯，旁行斜上，年经国纬，以统其时。”^⑤又

①刘知幾：《史通·外篇·杂说上》（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37页。

②郑樵：《通志总序》，中华书局影印《十通》本，1987年，第1页。

③《梁书》卷五十《刘杳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71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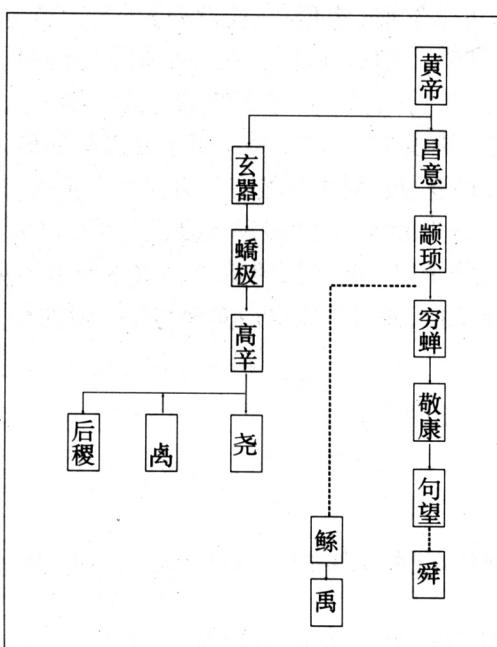
④道世：《法苑珠林》卷九《千佛篇》之《游学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3册，第351页。

⑤程公锐：《春秋分记》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如《四库全书总目》汤秀琦《春秋志》提要：“马迁作表，旁行斜上，体仿周谱，盖以端绪参差，恐其瞀乱，故或国经而年纬，或国纬而年经，使一纵一横，丝牵绳贯，虽篇章隔越，而脉络可寻。”^①凡此云云，所解释的实为“直行”加“旁行”的表体二维结构，并没有回答何为“斜上”的问题。

理解“斜上”意义的关键，还在于桓谭“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一句。此语指出两个事实：一是《三代世表》而非《史记》其他九表“旁行斜上”；二是《三代世表》有所继承，乃效仿《周谱》而来。这一点刘知幾《史通·表历》已说得很清楚：“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此其证欤。”^②以上两个事实中，后一个尤其重要。《三代世表》之所以效仿《周谱》，因为它们都是关于帝王继嗣世系的记载。世系记录，也是“谱”的原始意义：“图载象，谱载系，为图所以周知远近，为谱所以洞察古今。”^③至汉时，古世谱之书当有不少，司马迁撰十表曾“稽诸历谱”，参考各种谱牒甚多，《史记》提及者即有《五帝系谱》、《春秋历谱》等。《汉书·艺文志》亦著录有《世本》、《帝王诸侯世谱》。

从今世之科学观点来看，记述继嗣或世系之“谱”，却并非是一种“二维结构”，而是一种“树形结构”。“谱”的树形结构，乃由其专载“继嗣群”的性质所决定，表现为主干以下之分支所形成的扩展递进，瓜瓞绵延，可至无穷。以《史记》所述“五帝”为例，如果我们绘图表示，即为（虚线为世次不明）：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一，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254页。

②刘知幾：《史通·内篇·表历》，第48页。

③郑樵：《通志》卷二十一《年谱序》，第406页。

在表现功能及阅读效果两个方面，此类图示因其直观易晓，可以大胜繁文。后世家谱、族谱中，大多绘有树形图示（只不过绝大多数采用分栏形式而已），已可不论。早期世系著作，今唯《世本》尚存片羽，惜已无从窥其形式原貌。据诸家所辑佚文来看，《世本》大约有“帝系”、“王侯谱”、“卿大夫世”、“王侯”、“氏姓篇”、“居篇”、“作篇”、“溢法”等目^①。梁启超曰：“《帝系》、《世家》及《氏姓篇》，叙王侯及贵族之系牒也”、“《谱》者，年表之属，史注所谓旁行斜上之《周谱》也”^②，所言略有不妥。“谱”非年表，“王侯谱”、“卿大夫谱”显与“帝系”相同，皆为记载世系之书。既载世系，无论是否绘图，都必然以树形结构为内在形式，不可笼统地划归二维结构的“年表之属”。

由此，桓谭所云第一个事实的核心也就非常清楚了：《史记》其他九表是“表”，《三代世表》实质上是“谱”（或表、谱之结合）。尽管《史记》行文中“表”、“谱”并用，又将其编纂成果统一在“表”的名目下，但并不意味着司马迁没有认识到“二维结构”与“树形结构”的不同。《史记》分十表为“世表”、“年表”、“月表”三个不同类别，即明显表露出此一认知。以表、谱为一物，当是马迁以后事，如郑玄《诗谱》实质是“表”，亦名为“谱”。后世史书中世系内容均称为“表”，惟家谱、族谱仍名为“谱”。清人赵翼谓《史记》“十表以系时事”，又谓十表均“昉于周之谱牒”^③，笼统宽泛，非尽事实，未能明白“表”与“谱”的实质差异^④。

根据以上认识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史记·三代世表》的最大特色在于：它没有完全照搬旧有谱牒，而是进行了创造性发明，在一个图示中同时表现了“世次”与“世系”：首先，总体上以“旁行”与“直行”结合的二维方法，建立以“世次”为经，“世系”为纬的二维表格。其次，每一帝王又以阶梯形式构成不同树形结构的“世系”。再次，将夏、殷、周部分按旁行方向再次提出，即接续“是为禹”的“帝启”和接续“是为殷汤”的“殷汤代夏氏”以及接续“文王昌生武王发”的“周武王代殷”，均予以“提行”，将第二栏以下原本的旁行方向改为朝左斜上的方向进行阅读承接，通过下文空白实现与第一栏的合并。如下图所示：

①陈梦家：《世本考略》，载陈梦家《西周年代考·六国纪年》，中华书局，2005年，第192—193页。

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③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第3、4页。

④赵生群谓“《史记》诸表都明显有别于谱牒的体例”（《〈史记〉编纂学导论》，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72页），将《三代世表》包括在内，亦有未安。

帝王世国号		颛顼属	堯属	舜属	夏属	殷属	周属
成王诵	周武王代殷	黄帝号有熊	黄帝生昌意	黄帝生玄嚣	黄帝生玄嚣	黄帝生昌意	黄帝生玄嚣
……	殷汤代夏氏	黄帝生昌意	黄帝生玄嚣	黄帝生玄嚣	黄帝生昌意	黄帝生玄嚣	黄帝生玄嚣
帝泄	帝芒	黄帝生昌意	黄帝生玄嚣	黄帝生昌意	黄帝生玄嚣	黄帝生玄嚣	黄帝生玄嚣
帝启	帝禹	黄帝生昌意	黄帝生玄嚣	黄帝生昌意	黄帝生玄嚣	黄帝生玄嚣	黄帝生玄嚣
……	……	……	……	……	……	……	……
(此处为周诸侯世系)		阴影部分为原表空白					
是为殷汤		是为禹	……	……	……	……	……
文王昌生武王发		……	……	……	……	……	……

孙德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其《古书读法略例》卷六《旁行例》有曰：“帝泄以下之直行，既帝禹提行，帝泄诸帝，乃夏之帝王世，而周属一格，迄于‘文王昌生武王发’，又恐其混杂，故改旁行为直行耳。”^①但孙氏仅道其一，未道其二。《三代世表》如此做法的根本原因是夏、殷、周形成了另外的谱系，既要在一个表格中表现几种谱系，同时又要照顾到表格形式的逻辑性，并避免混乱，只有在大表中有规律性地嵌入小表。其中，夏、商部分仅为“简单表格”亦即简单的线性世系（因为其分支谱系，史载本阙，《史记·三代世表》即云：“自殷以

^①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卷六《旁行例》，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影印本，1983年，第338页。

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而于周代部分,《三代世表》则另起一表以示世次及封建谱系。如此一来,《三代世表》的第一栏方向为严格的“旁行”,形成了从黄帝到“共和”的朝代、帝王次序表,第二栏以下示以各个时期的分支谱系,并与第一栏连通,总体上实现了“二维表格”与“树形图示”的完美结合。而其实现手段“提行”,当正是桓谭所谓“斜上”的意义所在。

综上所论,“旁行斜上”就是一种“表”“谱”结合亦即“二维结构”与“树形结构”完美融合的逻辑表达方式。我们知道,中国文献载体成熟较早,书面文字之外,亦很早采用图、表(谱)的方式,以图更好地反映内容。但在竹简为主要载体的时代,图表(谱)大都只能另著之于木版,所谓“左图右史”,虽可相辅相成,然颇易于离失。此后知识水平既有提高,加之帛与竹并行,图示、图表之属有了更好的书写载体,遂能不断进化^①。从这个角度说,司马迁作为中国“二维结构表达法”和“树形结构表达法”的完善者,其知识史意义不容忽视。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①《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还有一些“倒行”亦即用倒行文字表达某种特殊意义,也属于一种逻辑表达法。